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转变时期中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李汉林 王琦 王颖 方明 孙炳耀

一、引言与提要

经过9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致力于完成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型向效益提高型的发展模式的转变；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努力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积极达到从传统社会向具有“小康水平”的现代化社会过渡，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

正确地把握这一非常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活动，要求人们同时实现两个最基本的社会过程。在经济活动中，要完成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上，则要实现传统的社会结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向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这两个最基本的社会过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对一者的疏忽必然会造成对另一者的滞后性制约，只有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才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

反思9年来的实践，我们曾在经济上胜利地推行了农村的改革，卓有成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分配、流通、金融、信贷、价格等经济体制的诸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的变迁，很多同志至少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把社会变迁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从而造成了全国性的社会变迁滞后、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不同步的失调状况。其主要表现是：

1. 社会体制变迁滞后。在推进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没有与之相适应地推进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两者之间的不同步，使得经济的发展受到体制的制约。

2. 社会组织变迁滞后。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大多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种社会组织仍深深打着传统社会的印记，使得任何社会组织都成为大家庭式的社会单位和实体，既自给自足，又集经济、政治、教育、福利、安全、社会控制等许多社会功能于一身，难以成为现代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率的组织载体。

3.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变迁滞后。在经济体制改革、新旧体制转换的非常时期，我们没有与之相适应地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这就使得许多传统的东西在制度上已经破裂，但许多崭新的东西却没有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上确立起来。特别是当双重体制带来双重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上的摩擦、冲突的时候，更是造成人们价值取向上

的混乱，迸生出疏离感、颓废感和无规范感。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社会振荡”，正是人们的价值与规范取向发生危机的典型表现，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迁滞后的集中反映。

4. 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认识滞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调整旧体制下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不合理的利益关系，重构一种新的利益关系格局。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阶层利益、阶层意识、阶层观念、阶层规范、阶层认同与阶层参与等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都处于一种若明若暗的认识状况。

5. 改革的社会变迁研究滞后。这又具体地反映在：

——当人们在强调加强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的时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简化为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人们一谈改革，也往往首先或主要考虑经济的改革，忽略和忘记社会层次上的改革与变迁。一系列事实反映了社会改革与变迁问题研究上的不合理：社会改革与变迁问题重要，但却常常不受人重视；对经济发展研究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强大的专业队伍，而对社会改革与变迁研究，既缺乏系统理论，又没有一支强大的专业力量；社会变迁与改革问题牵涉面最广、最复杂，但对它的研究却最狭隘、最贫乏。30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失误，改革以来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震荡”，不能不说是社会改革与变迁滞后以及对这种社会变迁研究所处的落后状态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当我们在实施一项经济改革方案的时候，考虑实施方案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后果较多，忽略和没有顾及方案实施所应具备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从而常常使我们毫无准备地遇到一些强烈的“社会震荡”。

——一旦产生了这种“社会震荡”，我们又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某一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定义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社会问题，对群众中的一些不满情绪不能加以令人信服的引导，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恶化了改革的社会环境。

——改革是千百万人的共同事业，它需要广大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但是，由于我们忽略了加强改革的政治透明度，沟通政府与人民大众的感情交流渠道，这就使得不少同志对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既缺乏高度的认识和热情，也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不能在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上实现对这种改革的社会心理转变，强化对改革后果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变迁滞后，社会改革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虚置状态，使得目前和今后的改革将遇到更大的社会阻力，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矛盾日趋激化，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将不断尖锐起来。在旧体制某些部分衰退、新体制相应部分尚未发育的时候，社会变迁滞后的状况还将会引起整个转变时期宏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我们不尽快改变这种超前和滞后的畸形状态，我们的改革就会很快面临前功尽弃、毁于一旦的巨大危险。

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改革的战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求我们不仅从思想认识上，而且从实际行动中都要用极大的热情深切关注社会的变迁与改革。根据改革形势发展的种种趋势和表现上判断，改善改革的社会环境，改变社会变迁滞后状态，调整人们对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从改革的整体上通盘考虑和规划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社会后果以及非经济因素制约，可能是我们摆脱新旧体制的胶着状态，使改革走出低谷的重要途径。

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观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概括地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对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发展的影响。这篇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在其自身成长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研究城市社区中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社会制约,探讨由这种联结与互动引发的区域关系重组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影响,反复地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始终属于两个不可偏废的侧面,对一者的忽略必然会造成对另一者的制约,只有两者之间的协调才能推动社区的全面发展。

在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在其自身成长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时,我们试图论证:任何一个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都需要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转轨变型;一旦在一个城市社区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经济发展的政治化倾向,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这个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成长,使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任何一个城市社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这个社区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都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任何一个城市社区的发展,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在冲突中注重整合人们的利益,是发展的重要任务;任何一个城市社区都是在中心——边陲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得以进步,对各个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依赖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在任何一个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示范效应总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反复地作用于社区的发展。

在研究城市社区中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过程的时候,我们试图说明: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中,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或者表现为外部生产力大规模地、集约式地直接参与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或者新的生产方式从外部间接地发生影响,或者两者相互交替地作用于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过程;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联结和社会互动的时候,总是表现为前者的扩散以及前者作用于后者的社会过程,而且,这种扩散过程总是一般表现为技术的扩散、人才的扩散、产品的扩散、经营管理方式的扩散这四个方面;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作为促进这种联结与互动的因素主要是体制、政策和政府行为因素,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也会起到制约的作用;作为诱发因素主要是有效需求因素;作为限制因素主要是传统因素。

在探讨由生产关系联结和互动引发的区域关系重组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影响时,我们也试图说明:

——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以及区域间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机制由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动逐步变为由利益所推动;要素的流动呈由东向西和加速度的趋势,并且由长期和固定逐步变为短期和非固定;

——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以及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直接作用于区域中的深层结构,使区域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与新的观念和规范、与新的生产方式和要素相切相交、相排斥碰撞、相融合渗透,从而发生剧烈的变化;

——跨区域、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出现,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最终将冲破行政性和地区性的约束,从而改变“虚拟区域和社区”的畸形状况;军工企业逐步向区域中的中心城市集结。这对于全面释放军工企业所蕴藏的巨大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扩散先进的生产要素,强化新文化、新观念和新规范的示范效应,提高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效率,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口在区域间的大幅度流动,起到了一种新的、现代的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载体的作用,使得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撞击下,在由此所引发的强烈示

范效应的影响下得以重组、整合和更新。

二、历史的回顾：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发展

根据世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城市社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实现这个社会过程的基本方式一般表现为：

1. 基于城市社区所处的地理区位（如处于沿海、沿公路线交通便利因素等），自然和逐渐地发展工业，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带动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在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2. 基于城市社区长期所形成的商品经济的文化传统，逐渐从自身结构中缓慢地分化出商业、工业、金融业等各种行业，在这些行业不断分化和兴旺的基础上，促进和带动城市社区的繁荣和发展；

3. 基于城市周围区域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开发资源引起工业要素的大规模集聚和发展，进而牵动和促进城市化的社会过程；

4. 国家和政府根据一定时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有意识地在一定区域中进行工业布点，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带动城市的发展。

参照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来思考，解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同样是一个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制约和促进、相辅相成的社会过程。在这个社会过程中，发展则主要表现为注入、自发和混合三种基本形式。

1. 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自发方式，主要是指基于自身商品经济的文化传统、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条件，在外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影响下，经过自身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逐渐地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推动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社会过程的方式。很显然，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涵括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社区。

2. 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注入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根据一定时期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有意识地在一定区域中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布点，大量地和集中地注入现代经济发展的要素，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带动城市发展的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外部生产力直接参与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内蒙的包头市、湖北的十堰市、广东的深圳特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社区。

3. 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混合方式，主要是指中国的一些城市社区在其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布局，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地注入大量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大规模地集结外部生产力参与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过程的方式。河南的洛阳市、湖北的襄樊市、福建的厦门市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社区。

根据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方式，从城市社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我们深入调查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

我们调查了江苏省的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镇江市及浙江省的温州市。这种类型城市社区的主要特点是，地理区位处于中国东部的沿海一带，隶属于上海经济区，直接接受上海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辐射，交通便利，经济水平较高；在历史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且最先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并以极其特殊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经济伦理与观念；这里自然资源虽然贫乏，但受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影响较大；人口密度虽然较

高，但人们的商品意识较强烈，人口的教育水平较高，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基本上是靠自身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来逐步实现的。很显然，这种类型的城市社区是按照自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我们也调查了内蒙古的包头市、东宁市以及湖北的十堰市。这类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地理区域处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在历史上，自给自足的经济意识浓厚，商品经济观念淡薄；现实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国家在这里的工业布点和集中地注入大量现代经济要素所引发，国家和政府大规模集结外部生产力参与这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这类城市社区的体制特征是，高元生产点和低元生产点并存，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并存；人口密度小，但人口素质的反差太大。很显然，这种类型的城市社区是按照注入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我们还调查了河南洛阳市、湖北的襄樊市和福建的厦门市，这类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地理区位处于中国的东部和中部，但大量的处于中国的腹地；这里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城市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经过自身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实现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另一方面，则由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大量集聚外部生产力，突击参与这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很显然，这种类型的城市社区是按照混合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三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发展，既体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又反映了不同的发展内容和特色。下面，我们试图通过简要回顾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经济与社会成长的历史进程，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之间的有机联系。

（一）自发式类型城市社区的发展

首先，让我们简略分析浙江省温州市的情况。该市地处浙江省南部，下辖9县2区，总面积为1.17万平方公里，人口为620万。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的城市。在南宋时期，温州就以“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而闻名全国。在清朝光绪年间，这里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蜂拥而至。使这里又沦为“瓯为海国，市半洋行”的境地。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温州人逐渐形成了长于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传统，有了一个较好的工商基础。以解放初期为例，1950年，全市15万人口中，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劳动者就有1.1万多人。在今天，这里虽然人多地少，人均只有0.46亩地，但物产丰富，地下蕴藏40多种矿产，其中明矾石产量占世界60%左右；海岸线长，约30多公里，可建500吨至10万吨级的港址多处，其中七里黄花港址，岸线3800米，水深近百年来一直稳定在8—13米；侨胞甚多，素称“华侨之乡”，海外温州籍华侨6万多人，旅居4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欧洲的就有4万多人。^①

基于这里优越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温州市完全可以经过自身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逐渐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迅速地推进和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过程。事实上，在解放初期，这里的经济也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据统计，在1957年，温州市的工业总产值为2.6亿元，比1949年增长2.31倍，平均每年递增24.5%；同期温州港的吞吐量为167.46万吨，比1949年增长9倍多，年递增率为33.69%。但是此后发展速度停滞下来，在1966年一

^① 参见袁思楨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张德喜等：《温州模式》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1976年10年间，温州工业的平均年递增率只有0.1%。^①

温州市经济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社区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环境遭到很大程度上的恶化。50年代到60年代，基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温州和大部分沿海城市被定为国防前线，35年间国家在这里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全省投资总额的3.24%，^②而且，紧张的政治气氛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这里经济的发展。十年动乱期间，这里武斗频繁，连年内战。政治上的狂热使人们根本无暇顾及生产建设，从而使温州的经济遭到更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其次，还因为人们不断地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定义和评价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造成人们经济行为取向上的极大混乱。1956年以后对这里首先兴起的“包产到户”的严厉批判，文革期间对温州人民从事手工业生产、外出经商等历史传统斥之以“弃农经商”、“劳力外流”、“长途贩运”、“地下工厂”、“资本主义复辟”，乃至以后政府所采取的不断搜查、罚款、拆屋、封门、关押等一系列极其野蛮粗暴的行为措施，都极大地打击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严重地恶化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取向形成了极大的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976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5.06亿元，到1985年则为42.23亿元，增长了8倍多；1976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80%以上，到1985年，二者的比重则完全倒了过来；1976年，全市财政收入不足3千万元，而1979年至1985年间，其财政收入则以平均每年16.9%的速度递增，7年中的财政总收入相当于以往27年财政总收入的79.2%。^③

温州市经过自身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迅速推进了工业化的社会过程，闯出了一条被人们冠之以“温州模式”的致富之路。这种模式的内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④据统计，198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个体经济的比重为30.7%，而国营经济的比重为18.43%，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与个体商业持平，同为27.5%。据了解，1985年全市共有家庭工厂10.7万个，联户工厂2.5万个，二者从业人员达40多万人，产值11.4亿元，占农村工业产值的61.5%，从绝对额上看，超过了城市全民所有制的产值。与此同时，民办商业的营业总额也与国营商业的零售总额持平，民办运输业的运输量占全市运输总量的60%。据调查，温州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共有417个，其中成交额在亿元左右的商品市场有10个，它们同民办工业相互促进，用市场的兴起带动民办工业的发展，民办工业发展以后又推动市场的形成。它们利用10万供销大军，传递信息、推销产品、拾遗补缺，仅以这10大商品市场为例，1985年成交额达11.5亿元，占全市商品市场成交额的32%。^⑤

导致温州市近年来飞跃发展的一个朴素的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抓经济建设的社会风气，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各级领导同志开始不随意从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定义和批判人们的经济行为了。特别是在温州，各级领导对人们从传统所形成的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来发家致富的良好愿望和行为，从抱着一种有意识的“无为而治”的态度，到逐步

①② 参见：《温州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1986年。

③④ 参见：袁思桢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张德喜等：《温州模式》，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参见：同上。

做到尊重、理解和支持，这都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经济行为的创造性和热情。事实上，当人们追求利益的愿望和行为自然地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社会尊重的时候，历史就会前进，经济与社会就会得到发展。温州以及全国其他类似于温州这种类型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的跃进，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然而，当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温州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却又忽视了事实上早已发生的、潜在的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在温州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所出现的个体企业中雇主与雇工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极其悬殊的收入差距，各种不同职业中不合理的工资倒挂现象，在这里面，有些是属于合法的劳动收入，有些则是通过偷税漏税、买空卖空等各种非法手段和由于我们政策上的不合理，钻国家政策上的空子而发财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把这些现象仅仅作为前进中的问题来敷衍，或者一般号召地进行处理，而没有从经济发展的社会后果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不合理的和非法的个人收入连续几年来的不断膨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毒化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动摇和毁坏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政治及心理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目前双重体制的摩擦、冲突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人们经济行为上的偏差，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所造成的危害比在经济领域所造成的损失要严重得多，而我们在认识上和行为上忽略对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的分析和研究，则会最终造成全面抑制经济与社会的成长。

让我们再分析一下江苏省常州市的情况。常州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中部，东接无锡、苏州，西接镇江、南京，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常州市管辖武进、金坛、溧阳三县，全市有人口306.8万人，总面积4211平方公里。这里在历史上一直是江南水乡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唐朝中期这里丝麻织物开始出名，明代出现手工作坊，近代工业早在20世纪就随着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的兴起而陆续发展起来。解放后，常州市经济建设发展迅速，从1949到1984年的35年间，常州市区工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递增12.8%的速度增长，翻了6番多；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3%，累计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家对该市全部拨款的8倍。现在的常州市已成为一个比较先进的，以轻纺、机电、塑化等加工工业为主的中等城市，同时进入了全国15个年工业产值达百亿元的城市行列。^①

常州作为一个按照自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之所以能在解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比较独立地经过自身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依据自身发展的惯性来逐步实现和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其主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原因是：

1. 常州市在历史上就有了一个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基础，形成了一支有商品经济意识和社会生产观念的产业工人及管理人员队伍。

2. 常州市地处宁沪杭三角区这一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带，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感应，使其具备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3. 常州市的经济结构属于产品大进大出的轻型工业结构，只有与其他地方实行商品交换才能生存与发展，这就在客观上使其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内蒙古包头或东胜市更具有商品经济意识和经济效益观念。

4. 常州市的企业组织结构是地方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中小企业多，使其不存在象包

^① 常州市经济研究中心：《起飞之前——常州市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研究报告》，1986年印刷。

头、十堰、洛阳等城市那样中央大型企业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联合受条块分割及大企业搞“大而全”等因素制约的状况，各企业力量相对薄弱，且分处于各个主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易于形成“共生”关系。

5. 国家对常州的投资以及工业资源的分配较少，使常州不得不走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经济的路子；由于国家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少，因而控制力也相对弱小，这就使得常州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变通能力。

6. 除此之外，常州市还有一大批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市、局级领导，这就为政府机构灵活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条件。

近年来常州市经济上的跃进，特别是企业群体的蓬勃发展所引发的整个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主要是因为：

1. 有了一个良好的全面改革的宏观环境及正确的政策推动。

2. 国内商品市场初步形成，使企业意识到以群体参加市场竞争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而为尔后经济结构的变迁打下了一良好的认识基础。

3. 一些企业发展的成功范例，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为更多的企业的模仿、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4. 常州市政府经济部门的协调和指导为其经济上的跃进提供了重要的行政性保证。

5.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发展自身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在日益增强。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城市社区，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只要能够有意识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逐渐同步起来，才能够真正使那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得健康、平稳、高速。

（二）注入式类型城市社区的发展

首先，让我们简要分析内蒙古包头市的情况。解放前的包头市，仅仅是北方的一个皮毛集散地。5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加快西部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就有6项放在了包头，以期合理开发和利用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国的支持下，一个解放后只有8万人口的市镇变成了一个百万人口的草原钢城，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

从理论上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资金、物资设备、技术管理、专业人才等现代化经济发展要素大量输入的过程，围绕着服务于这些大工业，地方工业就能够在它们的帮助和带动下逐渐发展起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完成城市化的社会过程，这既是当时国家在西部实施重点项目建设的初衷，也是整个西部社区成长的一种重要发展战略。但是，由于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行政性经济体制，使得包头的那些大型企业在客观上成为国家在地方上的一块“飞地”，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企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在条块分割的制约下，大型企业的经济技术能力扩散不出去，难以增强地方的经济实力，而随着这些大工业的发展，职工队伍迅速膨胀，生活问题和市政建设给地方政府的压力愈来愈大，包袱背得愈来愈重。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工业落后，无力为大工业成龙配套；地方经济基础薄弱，无力搞好市政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活服务，逐步改善生活条件；而在包头的那些中央大型企业，一方面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使它自我封闭，另一方面也迫于成龙配套的需要使企业变得愈来愈大而全，再加上包头地方政府无力解决这些大企业职工的生活福利、住房及子女上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也迫使企业办起了社会。这样的一种市长办企业，企业办社会的畸形状

况，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变迁滞后所带来的后果，它所揭示的是一种人文生态失调的社会现象。

其次，让我们再来分析内蒙古东胜市的情况。东胜市是内蒙古的一个盟市，地处偏远的鄂尔多斯高原，是整个伊克昭盟唯一的城市，它不仅是伊盟党和政府机关的所在地，而且还负担着为广大农牧地区 140 多万农牧民服务的功能。在历史上，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农牧经济区，交通不发达，仅有一条公路与包头相联，工业也十分落后。解放初期，这里只是一个村落，只有 6 家手工业作坊式的工业。70 年代以来，由于盟里发展的一些工业，大部分放在了东胜，才使得这里的工业初具规模。但是，这里的技术仍很落后，设备陈旧，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成本高昂而且利润很小。1979 年，伊盟和东胜市利用当地高质量的羊绒资源，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合作，以补偿贸易形式在原绒毛厂的基础上，扩大和改建成大型羊绒衫厂，由此带动了一批毛纺织企业，该厂在当年就收回投资，年创利税是原厂利税总和的 8 倍，投产 5 年就赚回四个半厂，产品行销世界 20 多个国家。正是在这个高元生产点的带动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迅速加快。1978 年，东胜市区工业总产值为 4346.78 万元，非农业人口为 37738 人，到 1986 年，工业总产值为 1.01 亿元，增长 1.33 倍，非农业人口 62722 人，增长 66.2%。其中，羊绒衫厂的产值占整个东胜市工业产值的 90% 以上，占伊盟的 80%。^①

这个典型的案例所揭示的是在不发达的城市社区，根据其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从外部注入现代经济发展要素以后所产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它告诉人们，正确选择这个特定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或部门以后，通过其自身的回顾影响（即指主导部门对那些向自己供给生产资料部门的影响）、旁侧影响（即指主导部门或产业对更大区域的影响）和前瞻影响（即指主导部门和产业对新工业、新技术、新原料、新工艺、新的管理手段出现的诱导作用），使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起飞。应该承认，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我们这个政府具有极强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度里获得了极好的初始效应。

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传统体制中政府对企业极强的干预性，使这个地区在尔后的发展过程中投下了许多社会的阴影。由于这个作为发展主导部门的企业，不仅经济效益高，工作条件好，而且在东胜市和伊盟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盟市有关部门都对此寄予很高的期望。这表现在人事安排上，厂长及车间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都由盟政府直接插手；在招收职工上，很多地方上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纷纷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了工厂；在利润分配上，盟市有关部门通过调节各种税种税率的办法，将他们的赢利转移到了一些亏损的企业，用鞭打快牛的办法，拆东墙补西墙；在职工的物质待遇上，理应贡献大，待遇高，但由于相互攀比的压力，使企业不能够理直气壮地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甚至一度还出现了与亏损企业在奖金、福利等方面处于同一水平的状况。同时，还因为其他的一些服务配套行业没跟上，刚刚组建和上马的企业也逐渐开始办起了社会，自己解决理应由社会解决的生活服务问题，从而一步一步地逐渐迈向人文生态恶性循环的陷井里。种种现象都反复说明，不创造和不重视优化良好的社会环境，再好的发展模式也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混合式类型城市社区的发展

首先，让我们来简略回顾河南省洛阳市的发展。洛阳地处中原，有“九朝古都”之称，历史上这里商品经济发达。在隋唐时期，洛阳城商贾云集，出现了“远趋商贾，牛马车兴，

^① 《可爱的鄂尔多斯》编委会：《可爱的鄂尔多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填塞道路”，“商邑翼翼，四方是极”的繁荣景象。解放以后，洛阳市一方面在和平环境中，经过自身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启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过程。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于国家在“一五”、“二五”期间，把156项重点项目中的七项定点建设在了这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为了“准备打仗”，国家又从沿海一带迁移了12个大型企业和科研单位。这样一来，由于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大量集聚了外部生产力，突击参与了这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从而使洛阳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从一个文化古都一跃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以农业机械、矿山机械、轴承、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加工为主的重型工业基地。

无论从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还是从人才结构和职工素质的状况来看，像洛阳这样的中部城市都有着和其他一些东部城市同样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发展的结果却使得他们与东部的一些城市社区相比形成了不小的差距。这里除去体制上的原因以外，文化传统的制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洛阳历史上为九朝古都，是我国著名的六大古都和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灿烂辉煌的中原文化不仅哺育了洛阳人民，而且哺育了中华民族，从而使每个中国人在今天接受历史和文化对我们的冶炼和熏陶的时候，总是会深深地感到一种骄傲与沉重、自豪与压迫的交织。

洛阳及广大中部地区为中国的腹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国文化的诞生地，在文化上与东部沿海区域相比，具有一些鲜明的不同特点。在近代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主要是在东部沿海一带区域强迫“中华帝国”打开了封闭的大门。尽管这使得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但它毕竟冲击了中国文化，冲击了封建的经济结构和建立在这个结构上的封建政治统治，带来了资本主义因素，在强迫中国以殖民地的结构与世界市场进行联系的时候，同时为中国输入和利用欧美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经验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广大的东部沿海区域以极其特殊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经济伦理与观念，使自身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交织与碰撞过程中异化、变态和发展。而在广大的中国腹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还没有波及到这里。尽管包括洛阳在内的中部地区也曾遭受过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但是，他们的文化侵略和渗透对这块中国文化核心区域来说，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正是在这种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作用下，使包括洛阳在内中部区域的一切经济和政治行为，都深深打上了这种文化的烙印，并深刻影响着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式。应该看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方面的作用。在积极的方面，它可以使一个社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具有较少的剧烈动荡和混乱；在消极方面，由于它总是要不断地自我复制，再生产出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从而使旧的内容顽强地生存下来，或者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使任何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任何一种经济与政治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制约。在洛阳的调查中我们看到，由于历史原因，洛阳市的小型企业都是在依赖大型企业或者在与大型企业配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独立的企业不多。这就造成了整个洛阳地区小型企业和地方企业对大型企业和中央企业的依赖有余而自立不足的经济格局，使得洛阳地区的小型企业和地方企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如果抽去了他们与大型企业及中央企业的联系，弱化了他们对这些企业的依赖，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同时，他们又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他们在知足者常乐的幸福中陶醉，在得过且过、不求

上进的惯性中循环。

企业互动上的文化制约同时还表现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求稳怕乱、安份守己的指导思想。在同不少企业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座谈过程中，他们介绍得更多的是他们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所办的事和所走的路，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在企业互动上的一些创新做法，很多同志却不以为然，指责他们胆太大，比中央文件还走得远，而他们自己则更多地作出符合于文化传统的常规选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同志既是今天改革的主体，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载体。恰恰是他们，使得传统文化的遗迹和现实改革的新貌顽强地共存起来。

让我们再来分析襄樊市的情况。襄樊市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这里曾是诸葛亮的故乡，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文化名城。据史料记载，这里自“晋汉以来，代为重镇”、“南船北马”、“七省通衢”。尔后战乱连连，因而逐渐衰落下去。解放以后，襄樊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缓慢启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运行机制。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中，由于多次的政治运动，使这种自发的发展过程不断受到阻碍。难能可贵的是，襄樊市的领导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抓住了一些历史的机会，有意识地动员和吸引了外部生产力积极参与这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从而使这里的发展出现了跃进。

概括起来说，襄樊市的领导抓住的历史机会主要是：60年代三线企业的建设时期，他们利用国家在这里建设50多个三线企业的时机，在积极与之成龙配套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地方企业，从而逐步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给已打翻在地的臭老九以人的尊重和信任，吸引了2千多名科技人才，从而为襄樊的起飞和跃进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时期，他们又不失时机地帮助山里的三线企业转轨转型，提出了军工企业就地就近向中心城市集结的战略方针，为卧龙山中的一只只“猛虎”出山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同时也为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襄樊市所抓住的三次历史机遇中，两次都与军工或三线企业有关，这说明了这些企业具备巨大能量和潜力。事实上，60年代末，在“要准备打仗”的政治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先后在这里投资12.96亿元，兴建了军工或三线企业57个，分布在襄樊所辖的谷城、南漳、宜城等9个县区内。经过20多年的建设，使这些单位共拥有固定资产10.74亿元，占整个襄樊市固定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980人，比全市科研人员总数还多32%。这些军工企业，既普遍具有设备先进精良、技术力量雄厚、科研水平高和民品开发能力强的优势，也大多存在开工严重不足、生产效益低、缺乏商品经济观念与规范、设备利用率低、人才闲置状况严重等方面的问题。^①

由于这些军工企业大多是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建设起来的，所以他们的绝大部分都嵌入在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穷乡僻壤。对襄樊市来说，长期以来，这些军工企业只是一股可望不可及的巨大科研和经济力量。这些企业不仅不能把自己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扩散和辐射出去，而且在那里逐渐形成一个高度封闭的奇特社区，其主要社会特征是：

1. 政企高度合一，一切以企业为中心，不少企业具有鲜明的战时经济体制的特征。
2.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上的限制，人们许多高层次上的需要只能得到低层次上的满足，或者说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这就造成人们时时产生出对现代化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

^① 襄樊市科委：《关于请求把襄樊市列入“七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汇报提纲》，1987年。

的失落感。

3. 企业办社会，人际关系亲缘化。为了稳定职工队伍，企业不仅承担福利、卫生、教育、生活等各种社会功能，成为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实体，同时还实行内部招工和退休补员的办法，用世袭式的就业方式使职工子女大都留在了本厂父母身边。据调查，这种具有串来串去亲戚关系的职工，已占这些企业职工总数的60%以上，一张张亲缘关系网复盖着企业，使职工都成为隶属于一定亲属关系的社会群体。

很难设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这些企业能够有较高的效益，能够为襄樊乃至全国的经济与社会成长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回顾中的理论思索

像上述的这些社会条件与环境制约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与变迁滞后影响经济起飞的典型案例，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

罗列事实和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导出有益的启示。从上述一些城市社区发展过程的简要回顾以及其他一些专题调研报告^①的详尽分析中，我们力图导出这样的启示，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发展的过程。

任何社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总是包含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两个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社会过程。在实现这两个社会过程的同时，又要求完成三个方面的转轨变型。

（1）经济上的转轨变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和平稳地转变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来，经济的发展迅速进入起飞与持续发展阶段，使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2）社会上的转轨变型。国家能为大企业提供各种各样均等的发展机会，人民的收入平等分配，大家都能够通过正当的途径以及我们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社会的财富”，如教育、健康服务、住房、福利待遇、娱乐享受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透明度大大增加，更多的人参与和关心国家大事，人民能够真正根据自己的意愿推选和罢免他们的“公仆”，民主管理和民主对话意识浓厚。

（3）文化上的转轨变型。在发展过程中重新奠定价值，肯定、支持和宣传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新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用现代化准则振兴民族文化精神，更新国民性，在调整充实中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2. 发展的体制因素。

上述三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充分表明，体制因素是制约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温州市的家庭工业企业和厦门市的三资企业中，我们绝对看不到吃大锅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因为那样做是要破产的，是会直接威胁每个企业和职工的生存。而在许多的国营企业，职工吃大锅饭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到处可见，以至成为这种类型企业的一种通病。体制规范行为，不同的体制产生不同的观念和规范，这是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发展的实践反复告诉人们的一个最普遍、但却最不易被人接受、被人发现的朴素真理。

3. 经济发展的政治化倾向。

^① 这主要是指我们在近几年中通过大量经验研究所撰写的20多篇调研报告。我们把这些报告已集中地收入了即将出版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的专著之中。

从各种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城市社区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一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在传统体制中，由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得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啮合方式发生错位，结果造成任何一个社区的经济发展都要服从于政治目标的追求和政治运动的进程，使得长期以来人们的各种经济行为被政治及其政治意识形态所批判和定义，使得政治对经济在中国长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经济发展的政治化倾向，导致人们无论在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取向都发生混乱。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政治目标的非数量性，造成人们在目标追求中由政治运动鼓起的狂热，常常支配经济机制以不符合规律的方式发展，于是经济行为呈现出一种从上至下的扩张放大效应，超出了客观规律的限制。这反映在计划下达过程中，层层加码，级级放大，自然形成经济扩张机制。于是为了反映政治形势好，经济结果和成就向上反馈时，就逐级“掺水”、层层膨胀，为下一级的扩张放大再助一把力。1958年的大跃进，十年动乱中的经济发展及1978年以后的“洋跃进”对城市社区乃至经济发展的影响，无不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政治化倾向所带来的恶果。^①

4. 发展的文化制约。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城市社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建立在这个社区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都离不开它所仰赖的历史文化背景。常州与温州的经济发展，正是基于他们吸取了自身发达商品经济文化传统的营养；西部包头和东胜地区的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区域商品经济的文化传统的不发达；而中部洛阳等地的迟缓发展，更多的也是因为有许多正统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制约。事实上，落后的经济背后必然有落后的文化及由此滋生的落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反之亦然。文化的滞后，必然会阻碍经济的持久发展，文化的发展，也必然会为经济的起飞开辟广阔的前景。反过来，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的挑战，它将导致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活动和人际交往关系出现深刻的变革，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事实上，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发展机制一经建立，便会迅速反过来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成长的巨大精神力量。

5. 发展的冲突与整合。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中可以看到双重体制所带来的摩擦和冲突。不同的体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并要求人们与之相适应。当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体制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时运行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对不同社会阶层实现利益的程度不同。于是，人们自然对不同体制下行为的后果进行相互的攀比，并逐渐形成相互的摩擦、抵触和不满。这样一种情绪的积累，必然会产生冲突。当人们不能正确地处理这种由改革所带来的冲突的时候，那么由这种冲突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就不可避免。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很多城市的领导同志对城市社区中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认识不清，这一方面使他们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改革的时候，不能充分兼顾和整合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又不能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而又习惯于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去观察、评判和定义这种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这就必然会增加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使发展陷入艰难的境地。

6. 依赖的发展与中心——边缘的社会互动。

事实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都是在中心——边缘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得以成长，在

^① 参看郭跃进：《论我国的经济周期》，载中青年经济论坛，1987年，第3期。

对各个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依赖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在厦门和常州这样发达社区,她们的发展一方面是依托直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则是紧紧依靠国内一些科研单位,致力于迅速将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洛阳和襄樊这样的次发达社区以及象包头、东胜这样的不发达社区,她们的发展一方面主要依靠社区内先进的和现代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互动,这具体地表现为中央大型企业 with 地方中小型企业的社会互动,在依赖中央大型企业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同时依靠东部发达社区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的辐射,依靠他们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援,没有这样的一种体现在不同层次上的中心——边陲的社会互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中国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都可能存在优势和劣势的不同情境的区分,形成一种支配关系。这就是说,居优势地位的社区、组织和社会成员具有影响、决定和控制处于劣势地位的社区、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能力和机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中心——边陲的社会互动关系形式。特别是当一定的社区和组织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具有了一定的集聚规模效益,形成一定的科学和经济辐射能力的时候,它就有一种向外发散的要求,以达到扩展自己权力、利益和影响力的目的。

从实质上说,处于高层次上的社区或组织向处于低层次上的社区或组织扩散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的过程,反映为中心文化的扩散,表现出中心文化作用于边陲文化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规范与观念以科学技术及其他各种物质形式为载体传递到低层次的社区或组织中,并与其中旧的规范和观念发生碰撞、冲击和整合。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中,边陲文化整合于中心文化,并在新的条件下得以更新,边陲社区的经济与社会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

值得忧虑的是,一方面很多城市社区以及城市社区中的经济组织和科研组织,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实体。由于这种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和经济单位及子系统之间高度的纵向一体化的社会特征,使得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社区都形成了一种“细胞式”的经济结构,任何一个生产或行政组织不论规模大小,都是一应俱全的整体,这就造成了中心的优势扩散不出去,“边陲”缺乏吸收能力,各个部门、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低,部门间、地区间具有较少的交易和社会联系。这种状况如果在一个社区中发展到极端,那么就会使得社区中的各种组织沿着社区凝聚力相反的方向作用,使社区最终成为“虚拟的社区”。另一方面,尤其是一些不发达社区及组织对国家和政府以及处于高层次上的社区或组织的依赖,只是仅仅或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没有能在输血的过程中,形成自身造血机能,也没有能在依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生长能力。

7. 发展过程中的示范效应。

一般来说,示范效应总是从积极和消极这两个方面作用于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心与边陲的社会互动和依赖发展的社会过程,同时表现为中心对边陲的示范效应,表现为边陲在对中心的模仿攀比过程中所实现的发展。从消极方面看,在双重体制造成摩擦、冲突的时候,相互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示范效应及相互间规范与观念影响的传递,往往会加剧这种摩擦与冲突,严重的甚至会酿成非常棘手的“社会震荡”。尽力发挥示范效应的积极作用,努力避免示范效应的消极影响,看来是城市社区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面临和应该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城市社区中的生产方式联结及其社会制约

在上一部分里，我们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变迁滞后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在这部分里，我们力图从现实的角度，深入探讨不同类型城市社区中的生产方式联结问题。在这里，我们所表述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那些在不同体制中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状况和方式不同，生产管理方式不同，从而派生出结构——功能各异的经济、社会与科研组织。而且，我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局限在先进的、现代的与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相互联结、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时候所出现的社会制约。

一般来说，先进的、现代的生产方式具有决定、影响和控制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的能力和机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者支配另一者的社会互动关系。特别是当一个社区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具有了一定的集聚规模效益，具有了一定科学、技术和经济辐射能力的时候，它就有一种以生产方式的形式向外发散的要求，以达到扩展自己的权力、利益和影响力的目的。事实上，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作用于另一个社区的时候，它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这个社区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在这个社会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对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作用方式与内容也都是不同的。

——按照注入方式发展的城市社区，这种社会过程则主要表现为外部生产力大规模地、集约式地直接参与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由此所引发的也主要是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现代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社会互动。内蒙包头市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包钢等几个大型项目在这里建成投产，国家在这里集中和大量地注入现代经济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在“全市支援包钢，包钢带动全市”的方针指导下，从而推动了这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各自都在相互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得以改造和发展。我们所调查的湖北省十堰市，也正是由于国家的直接投资、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在鄂西北的偏僻山区建成了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基地，使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弱化，现代的生产方式得以加强。

——按照自发方式发展的城市社区，这种社会过程则主要表现为新的生产方式从外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这突出地反映在“外引内联”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的科学与生产管理经验及方式和国内的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的联结与互动。在这种联结与社会互动中，国外的生产方式得以有选择的消化和吸收，国内的生产方式得以创造性的更新与发展。在江苏省的苏、锡、常、通、镇和浙江省的温州市，我们都能明显地观察到这种联结与互动的社会过程。

——按照混合方式发展的城市社区，这种社会过程主要表现为外部生产力的直接参与和新的生产方式的间接影响相互交替地作用于城市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由此所引发的主要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社会互动。从河南洛阳市的情况来看，首先是自我发展，然后在国家和政府的安排下，建设了几个大型项目，使外部生产力参与了这个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成长，接着也就引发了先进的中央企业与落后的地方企业的社会互动。湖北襄樊市的情况也是这样。首先也是依靠自身的惯性发展，然后就是国家的三线建设，使大批三线军工企业在这里建成投产，从而也带动这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接着自然就引发了先进的军工企业与落后的民用企业之间的社会互动。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30多年的历史来看，新的生产方式在一个城市社区的注入，往往是

国家和政府行为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和政府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利用它所具有的行政权威,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和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一些项目进行大规模建设,并在建设过程中,推动那个社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这种中央集权的政府行为以及在中央集权指导下的生产布局,典型地体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反映了国家高于一切,中央取代地方的亚细亚意识形态。

改革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人们开始比较自觉地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办事,在权衡各自的利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后再作出社会互动的选择。企业集团出现,人们在接受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扩散的时候对利益的考虑,标志着政府和企业行为世俗化上的巨大进步。

先进的、现代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联结与社会互动的时候,总是表现为前者的扩散以及前者作用于后者的社会过程。从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看,这种扩散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技术的扩散。这主要指先进和现代企业中的一些科学技术向落后和传统的企业进行转移和扩散。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技术扩散来增强落后企业和产品在同类企业和产品中的竞争能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并能引起一系列的技术连锁效果。

——人才的扩散。当外部生产力参与城市社区经济成长的时候,总是集聚了大量的人才,在那些先进的现代企业中,人才要素的配置状况总是处于良好或最佳状态,而在落后和传统企业中,这种状况则完全相反。以内蒙包头市为例,中央与内蒙企业所拥有科研人员竟占包头地区科研人员总数的53.9%。^①湖北襄樊市的情况也是这样,襄樊地区军工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比该市科研人员总数还多32%。^②人才富饶与人才贫乏各自在两极上的不断积累,使得不少城市社区在人才结构上造成畸形,也使得在尔后的改革中,僵化体制略加松动后,人才扩散具有了强烈的内在冲力。

——产品的扩散。这主要是指以产品扩散的形式同时把生产能力扩散出去,并在扩散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结构。产品扩散的形式主要有零部件产品的扩散、整机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扩散。从经济发展的观点上看,整机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扩散更有利于增强落后企业的实力,形成他们的生产能力。

——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这主要是指向落后企业和组织传授先进的经营生产和组织管理的经验,教导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技术规范和生产管理制度。比如厦门三资企业所实行的一整套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方式,正是人们对西方经营管理方式扩散的一种吸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技术、产品和人才的扩散,还是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其中都隐含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扩散,一种新的文化的扩散。如果不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深刻地认识这一点,那么,各种形式的扩散就不能完全取得预期的效益。

事实上,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作用于另一个城市社区的时候,由此所引发的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科研单位与企业组织之间的社会互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

^① 包头市委:《包头市工业发展概况》,1966年;包头市统计局编:《包头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1984年。

^② 襄樊市科委:《关于请求把襄樊市列入“七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汇报提纲》,1987年。

我们认为,在先进的、现代的和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联结与互动过程中,体制因素、政策因素以及政府行为因素可以起到促进这种联结和互动的良好作用。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不失时机地进行体制改革,能够不断地扫清联合与互动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在厦门特区所观察到的较之其他城市的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三资企业所实行的较之其他企业的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就是人们为扫清这种体制障碍所作的努力;其次,用新的政策投入刺激和引导企业行为有利于企业与社区的发展。比如在常州,为吸引外资到那里办厂,政府所制定的优惠的利税政策;在包头市为鼓励中央企业帮助地方企业,在减免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条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新的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刺激和引导作用;最后,政府行为的干预也能够大大促进这种联结与互动的社会过程。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都有着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具备的那种组织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巨大权威,有着很强的资源动员和调度能力。在传统体制中,政府能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配置这种联结与互动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按照政府自身的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动员和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保证互动与联结的顺利进行和发展。

但是,问题也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体制、政策和政府行为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严重阻碍两者之间联结与互动的限制因素。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

——体制上的限制。这里,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对这种联结与互动的严重制约。在包头和洛阳,实力雄厚的中央大型企业与实力薄弱、水平低、素质差的地方中小型企业并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畸形状态。中央大型企业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能力扩散不出去,成为中央在地方事实上的一块“飞地”;地方中小型企业接受不到这种扩散,从而自身在不断复制落后中徘徊。在襄樊,大量地方企业守着占该市固定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科研人员比该市科研人员总数还多32%的57个军工企业,而大叫人才不足、科技和经济实力不足,这不能不是我们体制所造成的一种病态。

这种体制上的限制,将城市社区的构成部分按所有制性质、行业和部门等标志纳入自己系统的结构,由此形成了社区中各单位尽管聚居在同一社区,但彼此分属不同的系统或行业和互不联系的状况。社区中各种组织的利益和行为规范主要由“条条”中的上级主管部门所规定。各种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对“条条”主管部门的依赖形成一种离心力,在各方面都沿着社区凝聚力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这就不仅使得社区中先进的和落后的、现代的和传统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发生严重的困难,而且也使得这些城市社区逐渐成为一个“虚拟的社区”。

——政策上的限制。这主要是指一定时期中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对这种联结与互动所产生的抑制性影响。在客观上,由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倾向,使得企业对国家政策变更以及政治环境动荡的反应表现得强烈和敏感,文革期间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使得这种联结与互动蒙上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的阴影。从历史上考察,尽管不少城市社区(如厦门、温州)有地理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有利条件,不少城市社区(如包头、洛阳、襄樊)有技术上依靠中央大型企业和军工企业的得天独厚,不少城市社区(如苏、锡、常、通)有自身发展的冲动,但是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构成形成这种联结与互动的现实可能性。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策发生根本的改变,对外实行全面开放,对内实行全面搞活,积极推动和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才使得这种联结与互动兴旺发达起来。这都充分说明了国家与政府的政策对社区的发展与建设、对

社区中的这种联结与互动的严重制约性。

——政府行为上的限制。理解了国家与政府的政策对联结与互动行为的巨大负作用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政府行为对联结与互动行为的限制作用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和政府所形成和具有的那种组织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巨大权威和很强的资源动员和调度能力，既可以极大地促进、也可以严重地限制这种联结与互动。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凡是在一些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互动搞得不好的地方，一般都表现为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企业的衣食父母与中央企业进行交涉。一旦这种交涉失败，地方政府就会利用他们在地方社区的权威，动员其管辖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与中央企业发生冲突和抗衡。在这个时候，地方企业作为地方政府管辖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和地方政府一致的行为。不难设想，在这种政府行为的干预下，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按照经济规律所发生的联结与互动将会变得多么坎坷和艰难。

在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由上述三种因素所诱发的另一种因素是有效需求因素。这种有效需求因素主要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表现出对先进的和现代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一种行为冲动。有效需求作为一种诱发因素主要是指这种因素对体制、政策和政府行为因素的依赖关系。当上述三种因素在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过程中起着促进作用的时候，有效需求因素也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反之，它也会构成对这种联结与互动的严重制约。

这种严重制约主要表现在对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有效需求不足，热情不高。从全国的情况看，在我国现有的5000亿元的固定资产中，已有35%的设备相当陈旧落后，还有25%的已经老化，总计有60%以上的需要在技术上全面更新。^① 在我国的机械行业中，达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水平的产品还不到10%。^② 尽管企业技术进步的客观需要如此强烈，但不少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对于这种客观需要反应麻木，缺乏企业家应有的热情。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厦门，有60%以上的企业与厦门市的科研单位没有业务联系，尽管厦门市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46个自然科研机构，1.3万名科技人员，8所大学，10所中专，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③ 这些情况都说明，企业对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对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的有效需求不足。

从理论上说，这种有效需求主要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的规定性，从企业和社区经济结构中生长出来的对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一种行为期望和冲动。从我们掌握的资料上分析，这种有效需求一般有六种构成要素。

——厂长意识。企业对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有效需求的人格化，说到底，就是通过厂长行为来体现的。厂长对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以及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水平和热情，直接制约有效需求的成长。

——支付能力。这主要表现为资金筹措和物力制约，这是促进或制约有效需求的物质因素。

——接受能力。这主要指企业现有的技术条件以及职工的素质。

——经营目标。这主要指企业对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客观需要必须符合企业不同发

① 何道峰：《我国旧体制下企业的创新意愿分析》，见《上海经济研究》，1985年4期。

② 国家经委技术改造局：《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③ 厦门市科委：《厦门市1986—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1986年。

展时期和发展水平上的经营目标，二者的有机整合，才能形成推动这种联结与互动的强大合力。

——市场条件。这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的市场制约。这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在投入方面是指技术选择和技术供给条件，在产出方面是指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需求。

——组织和制度保证。这主要是指在联结与互动过程中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生产管理和操作制度、人才培训和人事管理制度等的保证作用。制度规范企业的行为，同时也规范人的行为，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认识，而且是实践得出的结论。

实际的调查，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科学技术在一个社区或社区企业中扩散的深度与广度，先进的、现代的和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联结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区及其社区中的企业在多大规模上需要这种科学技术的扩散，在多大的规模上需要这种联结与互动，而且这种联结与互动以及科学技术的扩散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求。一旦社区经济与社会结构有了这种需要，它就能热情呼唤企业经济结构的重组，刺激联结与互动有效需求的成长。事实上，企业和社区对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有效需求的产生，不单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所致，它总是极大地受着体制、政策、政府行为的影响和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也总是社区功能与结构重组过程中的社会产物。一种宽松的社区经济社会环境，或者说，当体制、政策、政府行为诸因素处于良性循环状态的时候，则更容易诱导企业对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渴望，这就是有效需求产生的客观规定性。

传统的制约是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限制因素。这种限制因素首先表现在商品经济传统的制约上。比如我们在包头所看到的在联结与互动过程中只强调友谊与支援，而不讲各自的利益状况；在东胜所发现的鄙商轻商，导致第三产业落后，从而使这种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缺乏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在洛阳所观察到的不少地方企业在大而全的中央企业之外搞小而全，宁可重复投资，也不愿与大厂搞合作的社会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中所反映出来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都是这种商品经济传统缺乏和淡化所造成的制约。

其次，还表现在文化传统的制约。从我们调查的内蒙古地区来看，由于这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很容易得到满足；也由于这里人少地多，人们虽不富裕，但是温饱足足有余；再加上普遍文化水平较低，重牧轻商，轻利贱商，自给自足的思想深植于人们心中，从而形成一种可怕的传统惰性力，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使得在这些地方缺少由农业向工业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跳跃力量和促进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内在趋动力。尽管随着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注入了不少现代化、工业化的观念和意识，扩散了现代的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背景，使得西部地区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变得更加艰巨和复杂了。

四、生产方式联结所引发的区域关系重组

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不仅使一个城市社区内的各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也使得区域之间的关系发生重组和变化。在这一节里，我们不准备就区域关系重组问题全面展开讨论，而仅仅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探讨这种区域关系重组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影响上。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客观上呈现出三大不同区域，即在东部沿海一带的发达区域，中部与内地的次发达区域及广大西部与边远地区的不发达区域。在这三大不同的区

域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及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在东部区域，大部分城市社区都有着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尔后的发展又有着相当的工业与技术基础，现实的情况是人力、物力和财力雄厚，技术水平高，但自然资源贫乏；在西部区域，大部分城市社区都缺乏商品经济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统治地位，尔后的发展主要仰赖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收入，大量的输血却没有形成自我造血机制；现实的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虽有较高比重的中央大型企业，但与地方经济的融合程度低。有人做过测算，从哈尔滨到昆明画条直线，东南一侧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为90%，工农业总产值也占90%；西北一侧，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人口却只有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全国的10%左右。^①但是，这里的自然资源却极为丰富，富饶和贫困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中部区域，很多城市社区文化传统悠久，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但发展的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除一部分城市由国家投资外，大部分城市社区都是依靠自身发展的惯性，合着全国的步伐，平稳地实现着经济与社会的变迁。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这种跨区域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往往是由国家和政府依靠行政的力量，从全国的角度调动经济与社会资源来实现新的生产方式或生产要素在一个新的区域中的集聚和投入。“一五”期间，根据中央集权指导下的生产力布局，由国家和政府安排，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程大部分放在了中国的中部和西部。60年代中期和后期，在“要准备打仗”的政治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和政府又把大量的大型军工企业和研究单位从东部沿海一带迁移到了内地，形成了一股拥有2000多个亿的固定资产、数万台精良的技术设备、数十万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数百万优秀的产业工人大军的巨大力量。国家和政府的这种资源动员和调度的行为，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调整生产力的空间布局结构，向不发达社区注入先进的、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进而引起区域关系重组的积极作用。^②

但是，传统的体制却使得国家和政府的初衷被大大扭曲，政府行为所造成的有限的积极作用也被大大地弱化。一方面，国家向中部和西部区域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注入了大量先进的、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但另一方面，却又人为地把这些中央大型企业严格归属为不同的主管部门，人为地按行政隶属关系把中央和地方中小型企业这些经济行为的主体——约束在条条、块块之中，使先进的和现代的生产方式注入了落后的区域以后，却不能与落后的和传统的生产方式发生联结与互动关系，使大量中央企业成了事实上中央在地方的一块“飞地”，使得大量军工企业长期禁锢在僵死的国防经济系统之中，一直独立于国民经济的循环系统之外，造成国民经济“两个天地”的畸形格局。

传统体制管理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按照部门（即“条条”）和地区（即“块块”）建立纵向的层层隶属的等级体制，所有企业分别隶属于省、市、县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每一级生产领导者都只对他们的上级负责，国家行政部门成为产供销、人财物的直接分配者，计划指标按条块层层分解下达，基建项目按条块安排，资金和物资按条块分配、调拨，企业利润也按条块隶属关系层层上缴。这样一种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使得区域资源的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组合不是按照市场的机制和价值规律，而是按照行政的力量，这就必然使得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行为主体行政化。这种状况所造成的直接社会后果是，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注入

① 参看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经济日报编：《趋势与对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沈峻坡：《论我国的东西合作》，见《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一期。

落后区域以后，一开始就从体制上马上趋于封闭，新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能力得不到扩散，传统的和落后的企业也由于体制限制而对于接受这种扩散麻木，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整个社区和区域都按照条条块块被一一肢解，进而变成虚拟的社区和区域。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旧的体制有了很大的松动。正是在这种体制松动的背景下，区域之间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才真正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对区域关系的重组以及区域的发展和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区域间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区域之间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以及生产要素流动的机制从根本上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体制中，这种联结与互动以及要素流动主要靠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命令所推动，更多地靠的是一种强制的力量。而在改革中的今天，这种由行政命令的联结逐步转变为符合经济规律的利益联结了，对各自利益的追求变成或正在变成推动联结与互动、促进要素流动的最主要力量。而且，推动区域之间的这种联结、互动以及要素流动的主体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由国家和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企业单位或企业集团了。

——要素的流动呈现由东向西落差流动的趋势。东部区域为解决自身的市场和资源问题，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从而不由自主地、积极地向西部落后区域输出先进的、现代的生产方式和要素。西部区域则为了自身建设的需要，以输出资源为代价，与东部区域的输出相交换。

——人口的流动或以人口为载体的科技、经济与管理要素的流动从长期和固定逐步变成了非固定和短期。

——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由于传统体制的改革和松动而呈全方位的态势，这包括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中小型企业、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逐步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从商品经济规律出发，根据各自的利益追求，自由地进行联结与互动。在这种互动和联结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财、物、信息、科技、产品、商品等要素都开始按照各自需要流动，而且，由于诸如电视、广告、报纸、交通等各种传播和通讯媒介的普及和现代化，也使得这种要素的流动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

——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以及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直接作用于区域中的深层结构，使区域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在联结、互动和要素流动过程中与新的观念和规范、与新的生产方式和要素相切相交，相排斥碰撞，相融合渗透，从而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里，根据调查的情况分析，我们试图从一些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中探讨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对区域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以利益所牵动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以及生产要素流动出现了跨区域、跨部门组建企业集团的新形式，包头的北方稀土开发集团，十堰市的东风汽车联营公司，就是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一个或几个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由多个有内在经济技术联系的企业、科研、设计单位组成的跨区域的经济组织。

这种跨区域、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对于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对于区域关系的重组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种以骨干企业为核心，以龙头产品为支柱、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横向联系为纽带所形成的企业群体，能够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地生产大量优质产品，这对于先进

的、现代的生产要素在企业群体范围内有效扩散和重组，对于大大提高先进的、现代的和落后的、传统的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的效率，能够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这种企业群体由于其结构的开放性和自身的规定性（如专业化生产协作的需要），因而能够产生出很强的凝聚力和扩张力，它一方面以现实的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向自身靠拢，另一方面又以新形成的优势力量不断向外扩张。常州市企业群体的联合范围不断扩展，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迅速发展，部门、地区界限不断被突破的情况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种情况对要求各企业绝对服从本行业主管部门指挥的旧体制提出挑战。各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及其计划渠道的分散化与企业群体中各企业经营活动的统一性之间形成矛盾，解决矛盾则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摆脱原来主管部门的束缚，由企业群体直接同国家计划和市场沟通。这一矛盾的解决过程也就是企业由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过渡过程。很显然，一旦企业摆脱了“条条”的行政束缚，就会迅速改变将自己封闭于行业或部门内部的状况，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同其他社区构成部分发生联结，区域和社区的“虚拟性”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最后，由于跨区域、跨部门的企业集团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组合生产要素，联结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互动，这就必然要冲破分散、狭隘、封闭的旧格局，使以行政区域代替经济区域、资源利用方式与经济主体行为行政化、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由国家和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事实上，任何靠行政力量代替市场机制分配资源组合和生产要素，都必定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最终将冲破行政性和地域性的约束。

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引发区域关系重组的另一种现象是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联结与互动。在襄樊我们看到，这种联结与互动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主要包括：①围绕名优产品形成“拳头”，发展军民联合；②围绕开发技术起点较高，附加价值最大，市场需要量大的工业制品，在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发展联合，促进引进设备的国产化、产业化；③围绕企业技术改造发展联合，促进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④围绕军工企业入迁襄樊市区，开发民品，发展军民联合，壮大地方经济实力；⑤围绕军工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发展联合，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方式转化及科研和生产的紧密结合。

在调查中我们感到，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行为是，军工企事业单位有计划、有步骤地就近向其区域中的中心城市集结，这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不能够再靠国家大量的投资来维持，而必须全力启动自身运行的机制，尽快释放和开发其自身蕴藏着的极其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才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的真正希望所在。

军工企事业单位就近向其区域中的中心城市集结的意义在于：

——在宏观意义上，能促进和加速中国次发达和不发达区域的发展，以最小的投入全面启动这些区域的自身机制，使中国的东部和中部、西部区域一起，得到比较协调、均衡的发展。

——能极大地提高区域中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与社会效益。有了一定的集聚规模以后，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功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中部的一些省份，如湖北、河南、四川、陕西等，中心城市太少，许多城市还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在西部地区，这种状况则更为严重。从政策上鼓励军工企事业单位就近向其区域中的中心城市集结，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与社会效益，这对于这些区域经济与社会的振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能大大充实区域中中心城市的技术实力，提高中心城市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任何一个城市在一个区域中的中心地位，总是与其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能力联系在一起。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力水平愈高，经济技术实力愈强，这个城市对周围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就愈大。大批军工企事业单位就近集结到区域中的中心城市之中，无疑会大大加强和充实城市的经济技术实力，这对于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能大大加快区域中的中心城市自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大批军工企事业单位迁入区域中的中心城市以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要有一批地方企业与之成龙配套的问题，这就势必引起城市中的工业结构有一个较大的调整。其次，大批企业和人员进入城市以后，城市中的一些基础设施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完善和补充，以适应人们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一来，工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会推动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又必然会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使城市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程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从体制和政策上保证军工企业向区域中的中心城市集结，有利于全面释放军工企业所蕴藏的巨大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能力以及充分扩散先进的生产要素，使得生产方式的联结与互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科学技术和新文化观念及规范的示范效应，对于一个社区和区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生产方式联结与互动引发区域关系重组的另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人口在区域间的大幅度流动。率先启动的农村改革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和政府所施行的正确的农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中的生产力，使得农民的身份有了最大的自由。在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多地少的东部区域，更多的农民纷纷加入非农产业，离开土地去寻找更宽阔的道路；在城市，由于旧体制的松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不少个体劳动者加入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过程，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红红火火。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我们在包头、东胜等不少西部城市社区欣喜地看到，不少东部农村区域的农民在这里兴办第三产业，为活跃这里的经济，改善西部地区艰苦的生活条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1987年7月止，在内蒙东胜市市区经营的外来个体户达355户。占市区个体户总数的35%（在某些行业，如修鞋、服务加工、修售眼镜、修理钟表等项目，外来户竟占90%以上）；从业人数495人，占33%；资金34万元，占55%；营业额87万元，占68%。在资金和营业额上，外来户反客为主，都占了大头。据了解，在整个内蒙，每年从东部迁移来的流动人口就达100万左右，在陕西、山西、新疆、西藏等地，常年流动人口达三千多万。^①

一般来说，这种人口迁移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利益导向。他们是为了赚钱而来的。“先吃大苦，后享大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没有那些“支援边疆、开发西部”的远大理想，只有实实在在的利己追求。但无论动机的差异如何巨大，他们在事实上却干着同样的事业，确确实实对西部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执着的利己追求使他们始终如一地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没有思想的烦扰，更不担心理想的破灭。

第二，去留自由。他们是自己选择东胜或其他西部地区，是自愿而来的，没有谁给他

^① 王琦、方明、孙炳耀、李汉林、王颖：《西部发展与人口迁移》，载《瞭望周刊》，1988年第4期（海外版）。

们下命令。他们也可以选择别的地方，也可以随时回去。他们在家乡保留自己的户口，有自己合理合法的生活位置。即使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回去，也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是家乡的人，离乡而没有背井。这种去留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决定的状况，给了他们闯西北的勇气，形成了他们敢于来，敢于久留，敢于在这里生活和建设的心理支柱。

事实表明，江南农民创造的人口流动模式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一）可以保证合乎地方需要的人员流入。东胜人需要做衣服，于是流入大量的裁缝。一旦当地的服装师成长起来，不再需要外来裁缝了，他们就自己流向别的地方。（二）流动人口来西部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生活，没有生活顾虑和生活负担，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可集中于工作。（三）人口流动有助于打破西部的封闭状态，加强东西部交流，帮助西部尽快吸收东部的技术、管理方式和文化。

这些远道而来的江南人，在简单的赚钱动机驱使下产生的行为，创造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人口迁移新模式。他们做的是平平常常的事，却起到了一种代表新的、先进的、现代的生产方式载体的作用。他们服务经商的行为，大大改变了东胜和包头人对商业服务行业的看法，人们亲眼看见，这种“低贱”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仅从东胜市邮局统计，他们每年就有八十万元汇往江浙老家，也就是说，每户平均约两千五百元，这还没算上他们随身带回老家的款项。他们比人人尊重的市长、盟长的收入要高得多。眼见的事实改变了人的观念。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过去所鄙视的行业，从新的角度去思索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江南人的成功起到了一种示范效应，吸引人们追随模仿。有拜师学艺的，有合作经营的，也有自立门户的，越来越多的东胜人干起了这些过去看不上眼的行当。

从理论上说，当先进的中心文化以及现代的生产方式以人流、物流、信息流为载体，向一些不发达地区传播、撞击落后的边陲文化和生产方式的时候，它就能强烈地刺激那里的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欲望和向往，从而也就构成了先进的中心文化和现代的生产方式对落后的边陲文化及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强烈的示范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对先进文化和现代生产方式的模仿和攀比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由现代文化和先进生产方式所触发的模仿和攀比是文化、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在动力，它的最终结果是使边陲的文化整合于中心文化，落后的生产方式整合于先进的生产方式，是边陲文化及生产方式的更新与发展。这些远道而来的江南人，不知不觉地担负着文化及先进生产方式传播中“播火者”的使命，使得生产方式联结所引发的区域关系得以重组和更新。

注：本文是“城市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的总体报告之一。该课题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在课题的进行过程中，曾得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合作、支持和帮助。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颀